■我的文学观

文学路也是人生路

□金 戈（黎族）



郑朝能，笔名金戈，黎族，1983年生于海南保亭。中国作协会员。出版有诗集《穿越时空的对话》《木棉花开的声音》《钓一池好时光》《橄榄集》等

2009年某个秋夜，我一如往常独坐在面向卧室门口的书桌前写诗。突然，我感觉后脑勺被轻拍了一下，头向前一顿。我既惊讶又欢喜。似乎我的思维从那一刻起变得清晰，脑海一片清朗，世事皆洞明，对写作的认识似乎也提升了。

“我开窍了！”这是我的第一反应。拍打我的或许是缪斯女神吧？她为了奖赏我多年在文学路上的求索，也可能是可怜我逐梦写作的艰难，而赐予某种灵性和智慧，使我不至于那么愚钝。或许，那只是我某种内心感应。然而那的确是我在求索过程中一次重要的开悟。那时，距离我因贫辍学、立志当作家，已过去6年。

我来自黎族农村，父母原先务农，后来进农场当割胶工人，再后来进城务工，一家人就成了县城居民。父母工资微薄，我们家一直处在捉襟见肘的贫困状态，兄弟姐妹四人的学费从没有一次性交齐过。初中毕业前，我已决定放弃学业，唯有如此，弟弟妹妹才有学费念完小学和初中。我成绩还好，考上县重点高中民族尖子班，接到录取通知书时，我感到钻心的疼痛。可我不能继续读书了。我实在不忍心让劳累半生的父母在无尽的叹息里承受着生活的重压，我害怕他们垮掉。

其实我有过免费读职校的机会，专业是酒店管理，终因心理落差，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出社会打工，彻底告别校园。那时我对未来开始有所思考。不读书，前途在哪？哪条路才是我的人生路？

我选择了文学。我认为，写作并不受限于金钱，即使一个人一贫如洗，仍可以执笔行文，表达我的思想，抒发我的情感，讲述人间的故事。我想，写作是实现人生意义、从贫困里突围的一条光明之道。

文学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，而我坚信只要用心求索，坚持就会有收获，也会被看见。

文学路上那些“第一次”总让人难忘。我的文学首作是初二的一篇作文，一首写给外婆的悼亡诗《思念》，2005年发表在保亭县的一本内刊上，那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。2009年，一首赞颂抗争精神的诗《海上漂泊者》发表在《南岛晚报》，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刊物发表作品。2014年，我出版了第一本书，抒情诗集《木棉花开的声音》。2015年，我加入海南省作家协会。2022年4月，我一口气完成了三部叙事长诗：书写黎乡景致和风物、民俗的《黎乡仙游记》，写革命时期历史人物的长诗《穿越时空的对话》，赞颂琼崖纵队黎族战斗英雄陈理文的长诗《椰岛雄鹰》。

我始终记得我的人生路是文学路，一路穿过生活的荆棘而没有迷失方向。我当过五金店伙计、咖啡厅经理，也摆过地摊、卖过烧烤，在小饭馆当过勤杂工、服务员，也干过监控器电路板焊接工，干过景区导游、巡查员，还在娱乐场所当过多年保安。最稳定的工作，是在县城管局做办公室秘书。其间，我深受公文写作对文学创作的“伤害”，总是写不好东西，索性辞职去做生意，卖家具。可后来家具店倒闭，我欠下40多万元债务。然而，我的文学创作未曾停止，在经商期间，我还出版了两本诗集。打工、上班、经商的经历，给了我许多宝贵的阅历和认知，加深了我对社会、对人世的理解。我觉得，我所经历的那些，都是上天的安排，是为了给我提供写作材料。

我终究没有辜负那份偏爱。2024年是我文学路上最重要的一年。这一年上半年，我在鲁迅文学院第45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习了3个月，接受了专业的文学创作训练。同年6月，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；9月，我参加了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。至此，我用20年的努力，终于初步实现了自己的文学理想。对一个穿越贫困，有些执拗地冲向文学的青年人来说，多少算是一种成功。可我知道，这是一个新的、更高的阶段，也是更值得期待、更具挑战的阶段。

创作永远在路上，贵在不断探求。

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。认识自己，对创作助益良多。我成长缓慢，用了6年时间走过写作的“混沌状态”。“混沌状态”是梦的开始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、学习，摸着石头过河，抓破脑壳也写不出一个满意的作品。

作家必有一次痛苦的蜕变，才过渡到“不自觉的被动写作”阶段。我“蜕变”的过程就是不断回望和反思，大刀阔斧地修改旧作，再孜孜不倦地精进写作技艺。“丝滑的”写作阶段过去，我开始思考写作的价值。自2021年起，我进入了“自觉的主动写作”阶段，有意挖掘、反省、思考问题。自觉写作并不依靠灵感，也不再没有选择、没有目的，而是在清醒的认知上进行创作，是有方向、有把握的，因此也就有了质量，有了广度和深度。诗集《穿越时空的对话》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，这是我进入自觉写作阶段的首部作品，它集中体现了我对事物的看法和对历史、对人生的深入思考。

在“自觉的主动写作”阶段，我写了一本散文随笔集《与子书：未寄出的长信》，直面少年成长问题。我从“小我”里抽身，看到了“大我”，看到了民族、社会、世界。我开始思考民族性和民族的未来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，我更加关注自然环境，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和人类命运。我不觉得这是个人的空想或妄想。我认为，一个成熟的作家，不关心人类，不关心“大我”，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话，不算好的作家。基于这样的思考，我创作了长篇小说《仙安谣》，表达了我对民族尊严、人类命运、生存环境的思考，并以自己与身边人的现实困境，映照当代人的精神困境。这也是我对文学创作有了自己的理解后的大胆实践。

一个好的作家要清醒，不盲从，不以发表和获奖为目的，不被他人看法所左右。体裁对他而言并不重要，因为他有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认知，随时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任意一种体裁——他的思想、观点，可以通过不同的文体呈现。诗人、散文家、小说家、批评家的身份也不再重要，他纯粹只是一个作者。那时，民族、年龄、性别、地域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作家的思想体系和人生格局。我认为，那样的作家是深刻的、自由的、值得阅读的。写作中，我时常告诫自己，狭隘的民族主义、地方主义不可取，作品应该具有普遍性。

我感激生活，是它把我推上写作的道路。我感激命运的安排，那不是折磨，而是锤炼。一切的困难，都是命运为了成就我而设下的考验，为了让我有资格、有能力，担负起写作的使命。

文学之于我，不是装饰，而是庸常人生的精神舞蹈。

一砖一瓦搭建文学的木屋

□马青虹（藏族）



马青虹，藏族，1993年生于四川平武。中国作协会员，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。作品见于《诗刊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上海文学》等。出版有诗集《身体里的豹子》

“如果不写，我还能干什么？”我不止一次这样自问，也不止一次用同样的话回答自己。对于写作的人来讲，问题往往就是答案。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世俗意义上的爱好的人来讲，除了写作，几乎没有任何值得去做的事情了。

我的朋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，写作上的和生活上的。生活上的朋友有，但是不多。因为在与他们经常来往之前，我往往需要确定两件事：一是他是否善良。这种善良并非要求他是一个胸怀天下的大爱之人，而是至少要保持慈悲之心。二是他是否纯粹。不要求他们没有任何世俗欲望，但至少清醒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并且获取的前提是不主观地伤害他人，怀有对他者的恻隐之心。

生活上的朋友大都物欲较强，而我越深入自己内心的无人之地，物质层面的需求便降得越低。换言之，我对社交活动的参与度也越来越低。写作成了我唯一能持续投入热情的事，它不需要依赖外部条件，只与内心的真实对话。在寂静中书写，如同在黑暗里打捞星光，每一次落笔都是对存在本身的确认，正如“阳光会照耀每一个失去夜晚的人”。

在与写作上的朋友交流之时，我更倾向于与他们进行关于生活的对话，但所有话题似乎又都会被文学思维牵引。关于婚姻，会有抱怨，会有种种琐碎带来的疲惫，但在话题的最后又会回到对“关系”本质的探讨。柴米油盐的争吵，不过是存在主义戏剧里的某个幕间插曲。关于社会新闻、一次愉快或者不愉快的出行、路旁一棵形状奇特的树的讨论，最终都会滑向隐喻、象征和叙事结构的层面。

我们的交谈，更像是一场即兴的、口头的文学沙龙，彼此心照不宣地遵守着某种规则：只轻轻触及对方的内心世界，如同蜻蜓点水，涟漪散开便是对话的边界，绝不会贸然潜入那水面之下的暗流与深渊。

前两日和一位写诗的朋友喝坝坝茶。雨不大，一阵一阵地下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，沉默穿插其中。话题从一首诗的节奏，跳到眼前茶杯里缓缓舒展的茶叶，再跳到某个共同认识的、最后因各种原因而放弃了写作的朋友，语气里带着些许唏嘘，但不惋惜，也不感伤，更多的是怀着“允许它发生”的态度。这不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阻止，更多的是觉得“这样也很好”。沉默下来的时候，只听见雨声和杯碟轻微的碰撞声。那种沉默并不尴尬，反而像呼吸一样自然。我知道，在那沉默里，我们或许都在将刚才的对话，在心里悄悄地转换成另一种语言。

这种交往，带有一种矜持的温暖。

每一个写作者内心都有一片“无人之地”，那是孤独的堡垒，也是创作的源泉。我们会在边界上相遇，交换一些从各自领地开采出来的“矿石”——一个新颖的比喻，一段精妙的描写，或是对某个经典文本的独特解读。我们会为对方的发现而真诚赞叹，也会就“开采技术”进行交流。但我们绝不会踏入对方的领地深处，去探寻那矿脉形成的地质原因——那其中可能蕴含的创痛、狂喜或无法言说的秘密。那是一种尊重。我们知道，真正关键的挖掘工作，只能由那片领地的主人独自完成。任何外力的介入，都可能是干扰，甚至是侵犯。

而和生活上的朋友相处，则是另一种感觉。我珍惜他们，他们像锚，把我这艘总想漂往虚无之海的船，短暂地固定在坚实、热闹的码头。他们饶有兴致地讨论新买的汽车的性能，会为了一场牌局的输赢认真地复盘，会在酒过三巡后，拍着我的肩膀，说最朴实也最推心置腹的话。除了喝酒，我确实很难真正融入他们的快乐。当他们在牌桌上运筹帷幄时，我更多时候是在观察他们表情里细微的变化，试图理解那种纯粹的、基于规则和运气的兴奋感。当他们热烈地讨论着购物攻略时，我脑子里浮现的，或许是下一个小说中的人物在商场中左顾右盼时摆动的衣角。

酒，成了最好的催化剂。推杯换盏间，语言的逻辑让位于情绪的流动。我不再需要费力思考如何接话，只需跟着举杯，适时地发出短小的音节表示我在听。在这种时候，我似乎能短暂地触摸到那种脚踏实地的生活热情，那种不需要追问“为什么”、只需感受“就是这样”的简单和直接。酒醒之后，世界恢复清晰的边界，那种熟悉的疏离感又会悄然回归。我会带着一种混合着感激与疲惫的心情，独自回到我的书桌前，像整理行装一样，慢慢消化那些喧嚣的、具体的印象，等待它们在我的世界里沉淀、变形，或许最终，会成为某段文字里模糊的背景音。

我感激他们的存在，他们让我感到自己并非完全悬浮于空中，但我也清楚地知道，我无法真正扎根于他们所在的那片土地。我的根，执拗地伸向那片内心的“无人之地”，从那里汲取养分。与他们分别后，我总会需要一段独处的时间，像整理房间一样，重新整理自己的内心，将那些喧嚣的、具象的感知，沉淀为可供写作的、抽象的材料。

所以，兜兜转转，那个问题就像房间里一只赶不走的蚊子，总是在最安静的时候，在我的耳边响起：“如果不写，还能干什么？”答案似乎从未改变。写作，这件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不着边际的事，却是我唯一确认的、能安放自己的地方。它无关功利，甚至无关成就，它只是一种内在的必需，就像呼吸。

我渐渐明白，我之所以构建那个文字的世界，并非出于雄心壮志，而是因为只有在那个世界里，我才能获得一种完整的感觉，更确切地说，是对自我的一种完成。现实纷繁且嘈杂，我的感知是碎片化的，而在写作中，这些碎片被一种内在的秩序重新组织起来，哪怕这种秩序本身是脆弱的、临时的。这片“无人之地”不需要掌声，不需要理解，它自身的存在，就是它全部的意义。它是我用文字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、只属于我自己的小木屋。在这里，我可以躲避风雨，也可以独自面对内心的星辰与深渊。在这里，我可以是羞于耕作的懒汉，也可以是勤于劳作的蜜蜂或蚂蚁；我可以在瞬间让此处高楼林立，下一秒，这里又将成为不毛之地。我是这里的神。

堂吉诃德向着风车冲锋，是相信外面有一个需要他去匡扶正义的世界。而我呢？我清楚地知道，我的战场不在外面，而在方寸心域之中。我并非要向谁证明什么，我的“冲锋”，不过是日复一日地面对空白的稿纸，像西西弗斯推动他的巨石。写完一篇，巨石滚落，又面对新的空白。不知道西西弗斯是否会感到徒劳，但当我心神完全沉浸于推石的过程，当手掌切实地感受到石头的重量与纹理，一种奇异的充实感便会油然而生。那一刻，推动巨石本身，就是目的。每一次将石头推上山顶，哪怕它终将滚落，那短暂抵达的瞬间，视野为之一开，便已足够。写作于我，即是如此。每一次落笔，都是一次推动，一次抵达，一次对自身存在的确认。

窗外的天色不知不觉暗了下来，城市的灯火渐次亮起，像一片倒过来的星空。那些光亮背后，是无数具体而真实的生活，是朋友们的牌局、购物车和温暖的晚餐。我转过身，台灯的光晕温柔地笼罩着书桌，这片小小的光明，就是我的“无人之地”的入口。我不知道除了走进去，继续那看似徒劳的构建与推石之旅外，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。而当我写下第一个字的瞬间，寂静被打破，心便再次出发，永远在路上。

■编辑手记

场圃的春花与秋果

□刘河山



新疆昌吉 何 龙 摄

我手头一直保留着少年时期的文学刊物剪贴本，其中有1980年的《诗刊》和1982年的《人民文学》等。这些刊物都推出了“青年诗页”“新人新作小辑”“春花集”“新笋集”等青年作家专栏。如此阵势，不惜篇幅地推出了众多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，充满了“清新的气息”。在当年，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。今天看来也令人感慨：“扶持之意”的确是文学刊物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啊！

我认为，办地方刊物，就应当“高低起伏状，大小不等样；扶老携幼般，高矮胖瘦型；广种薄收式，杂树生花貌”。

2018年5月，我主持《回族文学》的改刊工作。对文学新人，我向来是高看一眼、厚爱一层的。文学刊物在面对青年作者时，应多注意他们的闪光点，哪怕只是取其一点、不及其余，允许他们稚嫩一些、单薄一些，甚至有一些小毛病，不完美也无妨。刊物应尽可能不拘一格，多给青年作家一些发表的机会、成长的契机，让他们迈出第一步至关重要。编辑之功，实乃发现之功、搜求之功、成就之功。也正因如此，作为主编，我极少主动向名家约稿。把有限版面留给具有潜力的青年作者，这其实更有意义和价值。看到青年的作品，我就像看到年轻时自己的蹒跚起步。我总是愿意伸出手拉一把他们，扶上马，送一程。我的目光中充满关注与期待，我的心中怀揣发现的敏感，我的手中始终保留推举的热忱。

2022年第一期《回族文学》，在“昌吉笔记”专栏开设了长期固定栏目“场圃集”。作为地名，“昌吉”曾有“场圃”之意，“场圃”意味着生机盎然，养育冀望。作为新疆昌吉州的文学刊物，《回族文学》就是尽培育之力扶持本土各族青年作者，知责于心，相扶相携，奋发跋涉于漫漫文学路。那一期首先刊发了2021年11月昌吉州作家协会中青年骨干培训班学员习作选，一连刊发了5位青年作者的作品。

“场圃集”栏目保留至今，许多本土青年作者从这里出发，他们中有汉族、回族、哈萨克族、维吾尔族等，全都来自基层一线。他们成长于“场圃集”，作品逐渐登上省刊乃至国刊，成为文学新星，一些人先后成为新疆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。他们是“场圃集”的春花，催生了一个个结实的秋果。

2026年5月4日，昌吉州文联作协、回族文学杂志社在呼图壁县五工台作家村·幸福里书院举办昌吉州青年作家马建斌长篇小说《一碗泉》阅读分享会暨昌吉州青年作品朗诵会。马建斌是《回族文学》重点关注的本土青年作家之一，在重点推出其作品的同时，选派其参加《西部》写作营、鲁迅文学院文化润疆新疆作家培训班。他从《回族文学》起步，散文、小说陆续发表于《西部》《安徽文学》《民族文学》。2024年，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一碗泉》，第二部长篇小说《手心里的城市》也将面世。在阅读分享会上，他情不自禁地说：“我的写作之路，离不开《回族文学》的重要帮助和鼓励，是《回族文学》给了我创作的动力、前进的信心。”

青年作者都在成长期。青年作家阅读分享会、青年作品朗诵会，都是我们助推其成长、发展、壮大的阶段性重要步骤。坐在会议室一角，我想到了扶持、培养青年作者是一个不计成本、不问收获的长期过程。他们是一棵棵挺拔的树苗、一点点闪烁的星光。能不能成为参天大树，能不能成为耀眼的星辰，取决于很多因素，依赖于很多条件，并不是一朝一夕、一蹴而就的事情。这都不好一概而论。毕竟文学之路，是一场无休止的马拉松。

我看着他们的面孔和身影，为他们这几年的进取和进步而欣喜。但文学期刊扶持新人，毕竟是艰难而复杂的课题。这需要情怀，也需要勇气，更需要理智，不可随性而为，也不能一拥而上。扶持新人既要“广撒网”，更要“精准筛选”，发掘、扶持真正有能力、作品真出彩的人。我想，保持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，会让一个文学期刊的办刊之路更清醒一些，也更踏实一些。

正因为要让更多的有志于文学的青年写作者看到希望、看到前途，地方文学期刊更应该对青年作者葆有扶持之心。这是期刊人永远的期待和永远的追求。我期待让刊物脚踏实地，让杂志平易近人，让读者满面春风，让拿起一本文学杂志的人，特别是青年人，如同进入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。

办好一个地方文学杂志是不容易的，也不是谁都能办好的。我想，地方文学杂志应当像我们新疆的大地一样，有巍峨大山，也有广袤盆地；有耸立高峰，也有幽深低谷；有奔腾大河，也有涓涓小溪；有千年不朽的胡杨，也有一岁一枯的草蔓；有参天挺立的高松，也有贴地生长的矮草。而更多的，是那些无名的、野性的、杂生的草木——它们，才是大地的底色。归根结底，我们关注的焦点始终在于：刊物的发展、作者的培育与读者的期待。

我心目中的文学杂志，正如一个广阔的场圃，开满春花，也充满秋果。但求耕耘，自有收获。

（作者系《回族文学》主编）